

佛教造像碑

李静杰

古人借助类同碑碣形式的石质材料雕刻佛像,创造出适用于地面寺院的佛教造型艺术造像碑。在印度次大陆,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,以及朝鲜半岛均有造像碑遗存,印度次大陆造像碑产生与建筑造像构件有密切关系,中国造像碑自有渊源,朝鲜半岛则继承了中国模式。中国造像碑拥有众多个体、丰富内涵和鲜明地域特征,是世界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一 造像碑的产生与供养

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广大地区,东汉、三国时期已出现了地面寺院,至迟东晋、十六国时期石窟寺院也发展起来。泥塑、壁画是最初地面寺院的主要艺术形式,石窟艺术在中原北方地区兴起以后,石刻成为陇东至中原东部地区石窟的主要造像形式,相对泥塑和壁画石刻具有比较长久的生命力,如亳州河清二年造像碑记:减割玆玩,□□□□,□□□□非固,以丹素之难永,敬造石像一□。将石窟雕刻形式移植到地面寺院中去,即出现了可以移动的佛教单体石造像。单体石造像包括造像碑、背屏式造像、圆雕造像和造像塔四种基本类型,其中造像碑是一种综合性的佛教艺术形式。东汉及其以后记事碑碣迅速发展起来,石刻造像与传统的碑碣形式结合,产生了造像碑艺术。中国造像碑的显著特点在于大多数个体既造像又刊铭,将次大陆的印度佛教艺术,与刊石记功垂名千古的中国儒家思想融为一体。往往刊刻长篇幅造像记和为数众多的邑子名,兼施浮雕、减地平雕和线刻等技法,在一相对较小的个体上镌刻种种形象,形成深为中国民众接受和喜爱的佛教艺术形式。

造像碑的施主主要有社邑、家族或宗教、个人以及共事者四种形式。一乡或一村佛教徒集体出资雕刻,南北朝时期非常普遍,这是与当时紧密的村社组织结构相联系的。如昌乐武定二年造像碑记:维那王貳郎馆率法义三百人等,信心崇道……敬造石像碑。偃师武平二年造像碑记:师比丘僧略……共邑义三百人,托志菩提,建崇弘愿……敬造神碑一所,尊像八堪(龕)。隋唐时期村社组织较松散,社邑组织造像的形式锐减。以家族为单位经营造像碑一直流行,其一为个体家庭,如青州正光六年造像碑记:清信士佛弟子贾智渊、妻张宝珠等,并为七世父母、历劫诸师、兄弟姊妹、所亲眷属……生生世世,值佛闻法,永离众苦,乃至成佛。其二是大家庭,如稷山武平三年碑为近亲数十人。还存在同一家庭不同时间出资经营的情况,如华县支家村延昌元年朱奇兄弟3人造像碑、建明二年朱辅伯造像碑与普泰元年朱辅伯造像碑。宗族造像北朝时期比较常见,晋西南北周陈氏宗族造像碑记:左冯翊太守陈□□六世孙合宗等,信心冲廊,并感玄风,慧能俱发……造四面石像一区。又蒲城天和元年128人造像碑记:佛弟子一百廿八人等……得信士都邑主昨和拔祖合邑等,共发□道场,迭相劝率,造释迦像一区。此碑邑子题名多昨和氏,是社邑组织兼宗族造像的一种形式。个人出资经营

造像碑一直比较普遍，隋唐时期成为主流形式。个人施主身分包括平民、官吏与比丘三种情况，平民施主如桓台神龟元年造像碑记：青州高阳郡安次县人孙宝禧，敬造尊像一躯，仰资父母。又愿居家眷属，现世安吉；一切群生，同归彼岸。官吏施主如南齐永泰元年王敬则造像碑、户县大业二年李渊造像碑。比丘施主如武定五年造像碑记：比丘僧兴造四面像一区，为七世父母，所（生）父母，愿使亡者托生西方妙乐国土，一切众生，□同成佛。共事者多为来自不同地域人出於共同目的临时组织起来的集体，属此情况者多为官吏或比丘众，如洛阳武定三年造像碑许多官吏出资经营。然而，上述四种形式不是截然分开的，它们之间有某些交叉的部分。施主出资后从采集石料开始，步入生产环节。雕刻时依据粉本设计，某些造像碑文字的书丹亦出名。雕刻完毕，五彩装陈，便成为沁阳武定七年造像碑记绮丽金颜，辉映楞伽的造像碑了。滑县兴和四年造像碑记：“李末、李次、李显族百餘人……（造）交龙石像一躯。访匠，妙尽於寰中；召能，募出於宇内……镂玉克金……论妙，拔汉所不能穷；语相，好思所不能及。偃师天统三年 22 人造像碑记：其像也，乃运玉石於荆山，采浮磬於淮浦。錫勒雕文，并龙鳞而璀璨；镂状图形，等金综而竞炎。有些造像碑已进入市场领域，石匠先雕刻佛像，留出造像题记和邑子名的位置，施主购得再刊记添名。

造像碑一般置於佛寺供养，如费县武平三年造像碑记：都唯那王文□率领道俗邑义四十人，敬造四面石像一区……置伽蓝之所。这也是造像碑多出土於寺址的原因，视碑之大小，具体场所又有室内和室外之别。有的树在路旁为人瞻礼，如耀县永熙二年造像碑记：北雍州宜君郡黄堡县邑主俊蒙……合邑子卅一人等……大路显敞之处敬造石像一区。极个别者可能是置於墓地的，如长治天平元年造像碑、唐千秋铭造像碑，这是造像碑与墓碑结合在一起的情况。

造像碑同其它的佛教艺术品一样，是佛教徒本着做功德结善缘，甚或慕化民众的指导思想出资雕刻的。偃师正光四年造像碑记：众生抱迷，群生丧目，若非大觉无以济其明；耶（邪）徒覓兴，有生到成佛道长远，非善不诣……童子拥沙，皆成佛果。此下法义卅人等建造石像一区……睹者生善，归心正觉。仰为皇帝陛下、七世父母、边（遍）地众生、有形之类，咸同斯福。造像碑在佛教宣传方面，尤其具有直观效果。沁阳武定七年造像碑记：妙色湛然，假朱紫以显其真；法性无为，托形言而标志德。解救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痛苦，希冀光明的未来，则是善男信女蜂拥出资经营造像碑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。洛川大统十二年造像碑记：合邑六十人……敬造释迦石像一区……伏愿……四方宁静，干戈永戢……四土普升常乐。人们多么希望佛陀保佑，结束战乱割据局面，过上太平日子。黎城开皇二年造像碑记：佛弟子赵仁惠在镇……敬造释迦石像一区。仰为……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眷属平安，早得相见；又愿部内五百人，法界众生，俱登正觉。人们往往希望借助佛恩，解除疾病痛楚。武平年间陈今刚造像碑记：佛弟子陈今刚多患，愿造像一区，今得成就。愿於今以后，合门家口平安，无病莠（长）受（寿），普及一切众生，一时成佛。户县大业二年造像碑记：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，因患先於此寺求佛，蒙佛恩力，其患得捐，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。超度逝者也是一个重要方面。梁天监五年造像碑记：益州刺史萧渊藻，为荆平乱贼，上求国永隆，□不幸□亡群生，愿腾游诸佛之所……敬造石佛碑像一区，普同供养。

二 造像碑的分布与时代

基于金石著录、文物考古论著刊布资料，以及笔者实地调查资料的补充与相互印证，统计出 1027 区造像碑，其中纪年者 684 区，无纪年者 327 区（见附表）。分布在西起陇东，东至胶东，北自华北平原北缘，南及成都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广大区域，遍及 11 省、区的 180 多个市、县。陇海铁路沿线及其偏北地方是造像碑的密集分布带，河洛与关中分别为东西两个

中心区。就造像碑的面貌和风格而言，中原东部、西北、苏南、成都地区是四个相对独立发展的地域部分。可考纪年造像碑自前赵光初五年（322年），迄清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，历时13个多世纪。根据纪年像碑统计结果，中原北方地区造像碑可以分成五个发展阶段：一，初创阶段，前赵至北魏早中期（386~493年）近两个世纪，占此地区的0.60%。二，鼎盛阶段，北魏晚期（494~534年）至隋文帝111年，占74.55%，其中东、西魏与北齐、周47年，占47.77%，为第一发展高峰。三，萧条阶段，隋炀帝至唐太宗时期45年，占1.79%。四，再繁荣阶段，唐高宗至玄宗开元92年，占17.41%，其中高宗武则天时期55年，占12.2%，为第二发展高峰。五，衰落阶段，玄宗天宝至清初11个多世纪，占5.55%。南方地区南朝造像碑占总量的1.75%。

时代		地区								时代		地区		
		山东	北京	河南	山西	陕西	宁南	失籍	统计			苏南	成都	统计
前赵			1						1	宋		3	1	4
北魏	太和十七年以前	1		1		2			4					
	太和十八年以后	14	5	15	8	37	1	24	104	齐		2	1	3
东魏		11	1	20	13			9	54					
西魏				2	6	22	2	4	36	梁		1	2	3
北齐		28	5	50	24			40	147					
北周				1	7	47	5	24	84	陈		1	1	2
隋	开皇、仁寿	17	2	5	7	22	1	22	76					
	大业以后			1		3		3	7					
唐	武德、贞观		2	1				2	5					
	永徽—长安	5	9	18	13	4		33	82					
	神龙—开元	5	4	11	2	2		11	35					
	天宝以后	8	3	4	3			6	24					
五代、辽、北宋、金		1	3	3		2			9					
元、明、清			1	3					4					
统计		90	36	135	83	141	9	178	672			7	5	12
无纪年		48	18	72	37	81	27	44	327				4	

三 造像碑的定名与术语

造像碑刊铭一般称碑像，偶尔称造像碑。称碑像或铭像反映了中国造像碑刊文于像，像文并重的显著特点，有的称四面石像表现了造像碑的雕刻形式，比较而言，碑像寓碑形、铭

记、雕像三者于一体，最接近这种遗存的内涵。宋《金石录》已统称为造像碑，这一名称逐渐被清代的金石学家和后来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沿用。造像碑是佛教遗存的一种，其中的任何一区都是该种遗存集合中的一个单位，并在研究时具有相对独立性，随着研究的深入要求对其科学地定名。情形有二：其一，造像碑自身具备定名的因素即地点、时间、碑主与题材。在地点方面，考古学习惯冠以县（市）为行政所属，以村（镇）作具体地点。该地点应为造像碑出土或发现地的现属行政设置。它们为造像碑的原置地点或相去不远。历史时期一定数量的造像碑被迁移过，唐咸亨三年裴居俭碑补刻铭记：清乾隆癸卯十月二十八日，奉政大夫、同知江南宁国府事曲沃裴志灏，从闻喜县裴柏村祖庄移来本县大里庄石佛寺，妆修供养。此碑原置地点无疑在闻喜。实际上清中叶以前被迁移过的造像碑多数无法澄清原置地点。因此，造像碑的出土或发现地点仅大体上反映了造像碑的所属地域。在时间方面，定名时以造像碑造讫时间为准，这时造像碑面貌已完全反映出来，而后来补刻的时间铭记则破坏了像碑原貌。在碑主方面，树碑的主要碑主一般出现于造像记中，记文未提名者可以邑子名中四面大像主、碑主名之，邑子名无名号者宜取像碑主要部位第一邑子名。造像记中的施主人数也应反映出来，如亳州咸平寺北齐天统三年石济周等 30 人造像碑。在题材方面，题材明确者如释迦像碑、千佛像碑、佛道像碑与刊经造像碑等。其二，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定名诸因素。在这种情况下力求根据像碑提供的定名因素和特点定名。缺乏具体地点时可冠以省籍或收藏单位名之。造像碑的具体生产时间不明确者，宜冠以大的时代概念，某些补刻纪年铭可作为造像碑特点用于定名。碑主姓名残缺者，选择像碑主要部位的可知邑子名作为依据较好。有些造像碑诸邑子几乎同姓可以其姓氏命名。多数造像碑的题材难以确断，可笼统地称之为造像碑，造像碑批量存在又无明显差异者宜编号命名。为了叙述方便，可以将造像碑原来所属的行政地点，与具体纪年结合起来作为造像碑的简称，如茂县永明元年碑。

造像碑术语的规范化，是科学披露资料和进一步研究的前提与必要条件。首先是造像碑量词问题。由于词汇的发展、演化，有些词的内涵今古有所差别。考古工作者称造像碑为通或块，它们与古称已无任何联系之处。通自身不带体积内涵，系文书等的量词，块则多用于小件物体以及砖石等，将它们用于造像碑尤其那些由碑顶、身和座组合在一起的造像碑颇嫌不妥。北朝以迄隋唐，造像碑铭记中绝大多数自称为区，少量为铺，个别为所。铺主要见于部分唐代造像碑，是仿效寺院组合造像出现的，重点突出平面含义，不适用于造像碑。所之称见于偃师北齐和甘泉后晋时期二碑，它多富空间色彩亦与像碑不符。区由圆雕造像躯的概念而来，造像树碑者往往不将造像碑与其它单体造像在概念上严格区别开来，从而躯也较多地应用于造像碑。总的趋势是躯渐向区转化并固定下来。当时区无疑具立体涵义，用于造像碑量词的一般概念。同时区还用于房舍、石窟和塔等，说明它不拘于躯的内涵，而且兼具空间内容，是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大概念量词使用的，但这并不妨碍用于造像碑。古人因袭已久的概念，今天的研究者仍然有必要沿其旧称。许多像碑铭记当阳像主、西面菩萨主等，足见，造像碑四面分别名之为碑阳（南）、碑阴（北）、左（东）侧面与右（西）侧面是言之有据的。值得注意的是左、右侧面的确定是以碑阳而不是面向碑阳的人为基准，同样，小龕的相对位置各以其所在面为基准确定，如碑左侧面下层右龕。佛教造像碑小龕中的诸人物以中间的主尊为基准名之为左厢菩萨、右厢弟子等，厢之名源于寺舍，龕象征寺院法堂。涉及同一龕中的不同造像时，厢之称谓是可以沿用的。

四 造像碑的研究

造像碑的研究可归纳为金石学、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三大部分，它们恰又是相互衔接的三个过程。金石学的著录集中在宋、清两代。宋代金石学家辑录诸石刻文字的同时，也注意到造像碑的铭记。但宋代涉及造像碑的著作尚少，且多数仅存条目，赵明诚《金石录》是代表性的著作。清乾嘉时期，随着金石学复兴，记录造像碑的著作纷纷涌现，收录的数量急剧增多，造像碑已成为金石学家著录的重要对象，其中《中州金石考》和《雍州金石记》是较早出现的两种，之后毕沅对关中、洛阳和山东逐地做了著述。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王昶《金石萃编》问世，收录造像碑甚丰，且兼备存目、录文、摹写与跋尾。此后，《寰宇访碑录》、《平津读碑记》、《揅古录》和《金石续编》等著作继出，但研究的宽度与方法均未超出前者。清末民初较重要的著作有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、《关中石刻文字存逸考》、《山右石刻丛编》、《山左访碑录》与《关中石刻文字新编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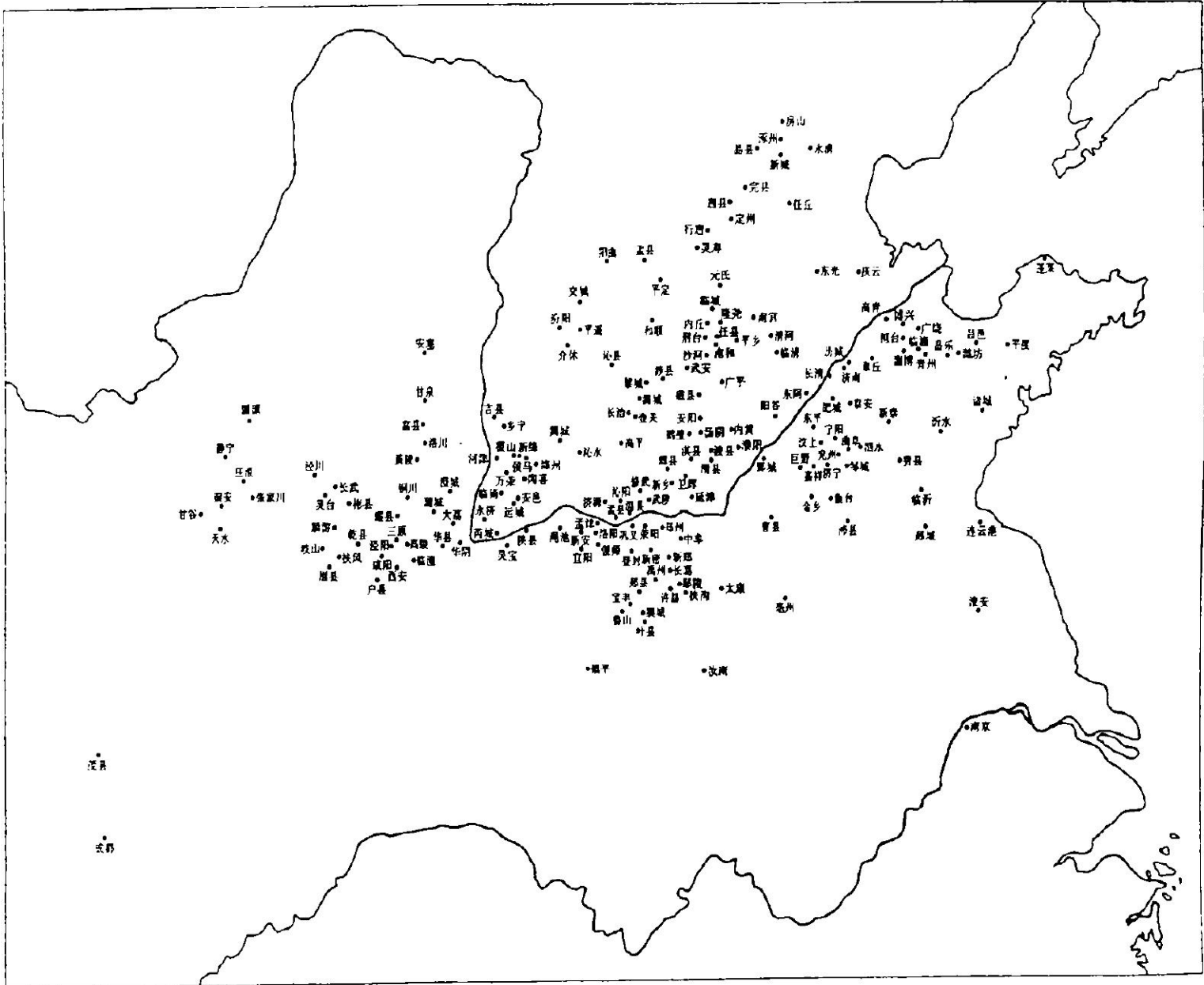
金石学者倾注心血搜罗造像碑拓本，有的还进行过实地调查。他们主要做了录文和跋尾工作，录文是金石著述最基本的方面，时下校对碑铭仍有重要参考价值，其中一部分又成为今天所仅见的资料。跋尾中关于流传情况的记述弥足珍贵，针对碑铭述及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考证，有助于了解造像碑存在的背景，有关别字的分析便于准确地认识碑铭。金石学研究的重心和目的在于证经补史，其中很多人为通古达儒，对佛教思想却有潜意识的隔阂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造像碑铭文的纵深研究，金石学巨擘王昶即其代表人物。时代意识与传统国学的局限，使得金石学者关于造像碑等单体造像的研究，终不能超出金石学科的限界。

20世纪初，外国学者从美术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雕塑，大大扭转了单纯研究造像刊铭的局面，注意雕像艺术的研究，并由此形成图像学方法，用此方法在佛教造像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，初步理清了中国佛像的发展脉络。他们记述石窟的同时，对单体造像也进行了诸多的记录和探索。1915年，日人大村西崖《支那美术史雕塑篇》刊行，资料系统详实，图文并茂，文字记录尤佳，留下许多后人难以见到甚至唯一可查的资料。1925年，瑞典美术史学家奥斯瓦尔德·喜龙仁《5—4世纪的中国雕塑》问世，除记录石窟和其它各类雕塑外，还批量地介绍了佛教造像碑。作者以纪年造像为主体，建立起时间框架，并根据造像的材质与风格，尝试性地进行了区域划分，继而将造像分为古典期、过渡期、成熟期、衰败与再复兴期四阶段。但是，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，喜龙仁的阶段划分只能是粗线条的，造像以现行省区为单位归纳分组，在造像自身所反映的区域风格更接近于古地理划分方面，亦表现出明显的不足。美术史学的研究有时片面注重雕像自身，忽视铭文的考察，也影响了对造像碑背景的认识。

20世纪50年代以后，中国考古学崛起。伴随着大规模的田野考古，发现越来越多的造像碑并见诸文物考古杂志。与此同时，诸博物馆旧藏文物也不断刊布。有的学者还对造像碑某些方面做了较深入的探讨，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。然整体上基本限于考古报道，迄无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。40年来，更无一部研究单体石造像的完整著述问世，实为中国考古学之憾事。造像碑是中世纪地面寺院的主流造像形式，通过对它的研究，可以了解当时佛教雕刻的整体面貌。

基于以上情况，笔者从三方面入手，综合考察佛教造像碑。其一，鉴于金石著录涉及到造像碑基本存在的时空范畴，而且往往不同著作著录了同一个体，笔者全面系统地阅览金石

著作，继承金石学成果，自然是内含巨大工作量的基础工作。其二，美术图录以及文物考古报告刊布资料，数量众多，直接运用这些资料，吸收图像学的合理因素，是研究造像碑的前提。其三，已刊布资料往往缺乏完整性，而且是造像碑集合中的一部分，为揭露造像碑的全貌，笔者于1991、1993和1994年，实地调查了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和四川的批量实物遗存，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。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印证和互补，比较完整地获得了绝大多数个体的资料。尔后，笔者运用考古类型学等方法分析整理，将现行的行政设置与古地理划分结合起来组织材料，由此揭露造像碑内涵并勾划出其发展的基本轮廓。



佛教造像碑分布图